

中国经济史学源流、发展与展望^{*}

魏明孔

摘要：中国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和重要分支学科，系现代中国经济学及史学和国际经济学及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文章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为代表的正史《食货志》、“十通”及地方志中有关经济内容的梳理，大体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源流，同时对近代社会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史的转型作了描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文章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并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 源流 发展变化 展望

一、绪论

中国经济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中国经济史学是理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和重要分支学科，系现代中国经济学及史学和国际经济学及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①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其时间断限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文明史。^②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主要关注的是已经过

[作者简介] 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河北大学，邮政编码：102488、071002，电子信箱：kongming9@126.com。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真知灼见的评审意见。

- ① 按国务院学科目录，理论经济学的6个二级学科中，包括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两个二级学科；在历史学中国历史一级学科中，经济史是作为二级学科专门史的一个重要方向。
- ②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由吴承明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I·中国经济史》则认为，中国经济史是“中国自远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经济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1988：1341）。这可能是基于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一种学术观点。

去的经济演变过程及其规律。虽然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记载与论述历史悠久,而中国经济史学作为严格意义的学科,其研究却仅仅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在西方社会,经济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早在19世纪晚期便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这是因为经济学已经比较成熟,原来历史学中有关经济的内容,现在可以用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来加以分析和揭示了。在中国,这个分野要较西方稍晚一些,大体出现在20世纪前期。中国具有重视历史记载的悠久传统,这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资料,使得经济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史料支撑与基础。^①从20世纪初以来,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耕耘的学者,经过数代的艰辛努力与薪火相传,现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学,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一朵奇葩。

近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当然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密不可分,也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有直接关系。下面只是在诸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经济史学的源流、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演变进行简要梳理,尽管这种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与此同时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略作展望,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中国经济史学的源流

历史上有关中国经济的记载可谓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范围内属于独一无二的经济史案例。如果我们从我国第一部正史,即汉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标志的“食货之学”开始算起,中国传统经济史较系统的历史便已超过两千年,其后的官修“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特别是完成于汉武帝时期由司马迁主撰的《史记》,除了《货殖列传》外,还有《平准书》和《河渠书》,比较完整地对应作者所在的汉武帝时代及其以前的传统经济进行了系统描述与精当总结。其后的《食货志》系正史中记述财政、

^① 对此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中国传统官修史书关注的是政治史和军事史,以及文化史,对于经济史的关注相对要薄弱得多。不仅如此,传统社会对于经济数据的记载比较稀少,更谈不上有系统的数据。即使对于经济的记载,由于受农本思想的影响,诸如工商业方面的记载尤其不多,这些均成为对传统经济史进行研究的瓶颈。

经济内容的专志。我们知道，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几乎用一半的篇幅论述“农殖嘉谷”的民食，用另外一半左右的篇幅叙述“金刀龟背”的货币，将两者合起来便是“食货志”。实际上，班固撰写的《食货志》就是将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平准书》以及《河渠书》^①进行合并与改进而成，^②且成为以后正史《食货志》的一个范式。为什么正史会以“食货”表述经济与财政呢？这是因为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在《洪范》篇中提及“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八件施政要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食”与“货”二政。其实在《史记》之前，先秦文献《诗经》《管子》及汉代的《盐铁论》等，都有一定篇幅记载或者论述关于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一些经验乃至规律性的总结。即使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也有一定的经济内容，其中在一些方面的论述还显得比较深刻。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把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作为“食货”之学的滥觞，这是因为其内容比较系统，且为以后的正史所传承，因此作为历史学中的经济史，或者说传统经济史，从《史记》开始算起未尝不可！其后正史中大部分都有《食货志》，从《汉书》到《清史稿》，至少16部中有《食货志》，即专门记载财政与经济的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史体系。

除了正史之外，开始于唐代的“十通”，^③其首部就是《通典》，它是由唐代宰相杜佑退休后组织撰写的，主要内容分为九个部分，而以篇幅长达12卷的《食货典》开其端。《通典·食货典》内容依次分为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赋税、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卖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平糴、常平、义仓）等。杜佑在序言中强调，“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与其执政时认识到经济对政治、文化和社会有重大的作用有直接关系，作者认识到传统社会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元代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卷1—7是“田赋”，卷8、9是“钱币”，卷10、11是“户口”，卷12、13是“职

① 按，以后的正史将《史记·河渠书》中的主体内容置于《地理志》中。

② 关于《汉书·食货志》的最新研究成果，系唐艳艳、赵德馨（2023）。

③ “十通”系《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0部政书的总称。

役”，卷14—19是“征榷”，卷20、21是“市糶”，卷22是“土贡”，卷23—27是“国用”（包括漕运、赈恤、蠲贷等）。《文献通考》从第1卷至第27卷，完全是经济史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至少在唐至宋元时代，当时的人们已经将经济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的因素，在正史《食货志》之外增加了记述经济史的体裁。“十通”中的其他八“通”，同样有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内容，且将其置于重要地位，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自宋代以后地方志编纂日新月异，并且以井喷的态势出现，1949年之前的地方志保存下来的超过8000种，地方志中对当地经济的记述往往是其重点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近人李泰芬在《方志学》中进一步强调，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在宋代之前，诸如《华阳国志》《蛮书》《山海经》等都是专门志书，另外正史中的少数民族传记，也有一定地方志的特质，均有经济方面的内容。再如《元和郡县图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均有丰富的包括经济史在内的地方史料。从宋代开始，地方志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体裁得以更加完善与独立起来，只是地方志一直没有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是历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正因为如上所述，正史、“十通”和地方志共同构成了我国传统社会经济史料的三个基本来源。另外，地下考古文物的大量出土，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直观且第一手的资料，其中有些考古实物或资料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是经济史尤其古代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除此之外，档案资料也是不可忽略的经济史史料的重要来源之一。不管是考古资料还是档案资料，越来越受到经济史学界的重视。

上面只是从传统经济史料的主要来源来说的，实际上古籍中的经、史、子、集中均有一定的经济史内容，这样使得经济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也使经济史研究史料的获得变得非常不易。

总之，正是中国传统史书中对于经济史记载的重视程度之高，使史书中有关经济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汉代以来正史的“食货”记载、“十通”中的经济内容以及地方志中的经济史料，再加上日益丰富的地下考古新发现，构成我们今天所能够继承的丰厚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近代乃至当下的经济史学仍然有一定影响。

三、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我国经济史研究曾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仁人志士为了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经济史成为其构建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之一，使得当时经济史研究的实践性和理论针对性非常强，其中关于中国道路的大论战影响尤其深远，产生了一批至今影响巨大的重要研究成果和重要代表人物。第二次高潮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约 45 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多有曲折，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学系（院）完全取消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课程，但从整体上看仍然不失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期，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开花与纵深发展的格局，研究成果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值得一提。

（一）近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转型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梁启超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当时的史学革命。梁启超曾对经济史研究有专门的论述，他是如此强调经济史的重要性的：“经济事项，譬如人生的血液。我们做经济专史，可以因人类经济行为的发生次第来做分类的标准。”梁启超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中国经济史中最重要的是消费和生产，其次是交易，最后才是分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其排列顺序是否合理，而将经济史与近代经济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或者说梁启超的经济史理论明显受到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比做经济史更加困难的领域，这是“因为资料极其缺乏”。正因为如此，“凡关于经济事项，若研究其历史，不能不和政治史、文化史脱离而另取一方向”。这就是说，经济史研究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其要领。梁启超同时指出，“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经济史当由今及古”。这种与政治史、文化史研究逆向的研究方法，是鉴于经济史史料匮乏的实际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对于研究路径，梁启超认为专题研究比较适合经济史，“进一步到生产方面，分别为渔猎、畜牧、农耕、矿业、家庭手工业和现代工业，每一种须一专史，中间看哪一种最发达，历史也跟着

详细一点”（梁启超，1987a：273—276）。这是我国学者较早对经济史资料、专题研究及理论方面的系统探讨，其中将经济史与当时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思路，即使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1987b：5—6）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就“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之中国史，其重要项目”中有关经济史方面的主要内容，提出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基件，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其进化之大势何如”？二是“农工商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其推移之迹何如”？三是经济制度，比如货币的使用，所有权的保护，救济政策的施行等等，路径变迁是如何进行的？其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如何？四是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流动的状况如何？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何？五是“与外国交通后”对我国的经济的变化产生了什么直接影响？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有关经济史的诸内容，或者说其关于经济史的“五问”，确实是经济史研究领域难能回避的核心问题，即使今天这些问题仍值得思考并给予回答。^①实际上，早在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就由广智书局付梓，这无疑是20世纪初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之一（杨祖义，2004）。^②由此可见，梁启超关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是在其对具体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20世纪20年代末陶希圣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强调西周系封建社会，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制度便开始瓦解，但封建经济则一直持续到16世纪。尤其重要的是，陶希圣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庄园制度、农民状况，以及分封制度等进行了叙述与分析（陶希圣，1929：1）。瞿同祖于20世纪30年代采用当时西方盛行的封建社会理论来比照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强调封建社会的要点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等。瞿同祖强调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瞿同祖，1936：4）。时值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虽然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是已经有人将封建作为一个社会来认识，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制度了（马克垚，2008a：375—376）。这无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且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今日，其学术魅力耐人寻味。

^① 关于梁启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五问”，笔者将另文作专门讨论。

^② 赵德馨、虞和平等均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

中国近代“食货学派”以食货学会1934年底创办《食货》半月刊为标志出现了。《食货》在创刊号“编辑的话”中开宗明义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并进一步强调，“这个半月刊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一点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并且，也不是已有丰富的材料。这个半月刊要集合，要欢迎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登载。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从创刊号的目录可以看出其作者阵容的豪华、题目的恢弘：鞠清远《汉代的官府工业》，何兹全《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李旭《魏晋南北朝时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陶希圣《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与田赋改革》，全汉昇《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但是，《食货》半月刊到1937年7月便寿终正寝，只维持了两年半的时间，共出版61期，^①甚至连结束语也没有来得及表达。其中原因相当复杂，作为食货学会的会刊，《食货》半月刊是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学者的学术刊物，定位为“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其在创刊号“编辑的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并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这是其办刊短命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处在抗战特殊环境下，其寿终正寝也就不难理解了（魏明孔，2016：485—486）。

20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无论在社会史大论战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亦是如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影响深远。近代经济史学转型过程中，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前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重镇，汤象龙、梁方仲、罗玉东、严中平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该所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功莫大焉！早在20世纪20年代，傅筑夫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写成约23万字的《中

① 《食货》于1971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复刊，现为月刊。

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专著，于1931年4月由天津百花书局出版，这是其计划“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研究中的一部分。傅筑夫的研究顺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他的学术研究自觉参与了中国命运大论战，应该说他的研究比较接地气，具有理论高度。严中平20世纪30年代到南通等地进行手工纺织业的调研，最后写成《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系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个案分析，先后印刷出版过多次，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途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一个是“卜凯农户调查”。在农户经济调研中，这两个调查尽管调查者的背景不同，但其成果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至今方兴未艾。正因为如此，当年农户经济调研者所在的单位，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农业大学成为研究中国农户经济的重镇，当在情理之中。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的“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1929—1933）丛书”，已由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由隋福民撰写《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统计局、河北省统计局整理编辑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1929—1957）》，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1年付梓。这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是非常有价值的。应该说，当时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案例。

近代的经济史研究成果辉煌，这些研究既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后世经济史学科的基础和“史料”来源之一。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是今日经济史学界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新中国关于社会经济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史学界变更了研究范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近代社会经济进行了全新的讨论，其中历史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即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问题，几乎都包括了经济史内容在内。时下对当年集

全国历史学界之力进行诸如这五个问题的讨论，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认为当时研究有以论代史之嫌。平心而论，其对于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如关于封建社会的讨论，即使今天仍然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后来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李根蟠，2018），以及关于唐宋变革（李华瑞，2010）、富民社会（林文勋、田晓忠，2022）、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赵轶峰，2017）的讨论等，均对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限于篇幅，下面只是就近年来封建社会名实的讨论情况略作梳理，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一个粗线条的了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即名实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至今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开始，“封建社会”的提法就比较普遍；到50年代，在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中，也必然涉及封建社会概念的内涵问题。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何兹全等，对此均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冯天瑜《“封建”考论》自2006年出版以来便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冯天瑜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学术界流行半个多世纪的“封建社会”论，实际上是一种“泛封建观”，其与“封建”的“本义”和“西义”，以及马克思的“原论”均有悖离。为此，冯天瑜提出了一个包容古今中外词义的历史分期标准。他认为，“封建”本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冯天瑜，2006）。与此同时，世界史研究专家侯建新也认为，在我国将西欧的“feudalism”社会视为具有适用于包括在中国历史之内的普遍意义的“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最初源自严复的误译；继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概念，特别是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视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期，从此中国和西欧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侯建新，2005）。

对冯天瑜和侯建新关于封建概念的观点，学术界给予充分肯定者有之，对其进行商榷和批评者亦不少。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在北京的部分学者于2007年11月召开了史学理论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对“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①会议讨论的内

① 这次学术会议的针对性比较强，而冯天瑜、侯建新等先生却没有出席会议，是有点遗憾的。

容最后以《“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2008)^①出版。下面是其中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林甘泉(2008:25)在《“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中强调:封建社会的命名和时段判断,实际上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史学理论问题;冯天瑜将主张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说成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泛封建化”,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中国的产物,是毛泽东“泛化封建观”支配史学界的结果,这就把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完全政治化了。李根蟠(2008:37)《略谈马列主义的封建观和社会形态观》一文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抽掉这块基石,唯物史观就要倒塌。如果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逐一抹杀,那么,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唯物史观就基本被否定了。马克垚(2008b:77)《封建主义概念的由来与演变》一文认为,关于封建主义,虽然西方学者强调的是封臣制和封土制,但从它产生的那时起就和当时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制度联系在一起,只讨论狭义的封建制是不可能的;所以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才说,狭义的封建主义远没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重要,可是狭义的封建主义妨碍了对封建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其他国家的封建主义。作者强调,我们应该避免苏珊·雷诺兹说的这一缺点,用比较研究把封建主义、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研究推向深入。张岂之、刘文瑞(2008:86)《封建社会概念辨析》一文的基本结论是:“封建”这一词汇,在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中已经发生了语义变化,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广泛运用,究其本质是学术性的,是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尝试,是不可以任意加以否定的;探究其演变,发掘出这种演变中包含的学术成就,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推进学术创新。

吴承明(2008:110—111)在《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中对中国经济史发展历程梳理后强调,秦汉以后至明清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李红岩(2008:172、219)《20世纪30年代的“封建”论争》一文的基本观点是: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

^① 按,该论文集也收录了部分未与会学者的文章,包括冯天瑜和侯建新的文章。

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封建社会的起点上认识虽然不同，具体的论述角度也有差异，但遵循了共同的原则，即全都顺应了时代要求，强调了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规律性与一元性，对中国社会特殊论、商业资本主义说，以及诸如封建社会并不由奴隶社会演变而来、奴隶社会还在封建社会后头之类的观点，均给予批判，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下限上，观点一致。作者认为，这种一致，其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对于破解中国社会特殊论，将中国历史梳理出合乎人类普遍发展规律的谱系，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陈支平（2008：265—266）《跨越时空论“封建”》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一词为大部分中国学者乃至民众所接受，成为俗定约成的时代名词，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形成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作者指出，在近代工业化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其各自自由而产生的生产方式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同一历史阶段里。虽然地域的不同与文明发展道路的差异，导致了各自“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其社会本质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只有以超越时空的广阔深邃视野，以粗线条的规律性的探索归纳，才能从更为理性化的角度来辨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而避免过去那种对号入座式的纠缠不清的繁琐讨论。李根蟠先后于2004年、2007年发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封建”名实析义》等论文，阐述了其对封建概念的系统认识（李根蟠，2004，2007）。

冯天瑜（2008a：303—304）《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一文的主旨是：汉语旧名“封建”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还用来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职、人身关系、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此为古时不刊之论。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等，这些都属于“封建”被泛化，脱离了“封建”本意指向，也与“feudalism”的含义大相径庭。故“封建”概念的厘定反映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涉及“名”与“实”、“概念”与“所指”的切合性，直接关系到古史分期及社会形态把握

等历史宏大叙事问题，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发展均相关联，故对其探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另外，冯天瑜（2008b：310—332）在《严复、陈独秀“封建观”比较》一文中还对严复和陈独秀的“封建观”进行了比较研究。黄敏兰（2008：334）《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在确认的西周的、西欧的和五方式理论的“封建”概念外，还有第四种封建概念，这便是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概念，且不能将其与五方式论的“封建”混为一谈，因为其中包含的大多是中国自身的内容。五方式理论的“封建”概念是中性的和高度抽象的，而中国的“封建”概念多是贬义的、批判性质的，针对的是中国社会里存在的种种具体事物和制度——基本上是落后的和丑恶的。这一特征和表现，无论是在西欧封建概念还是五方式论的封建概念中都难以找到。现代中国人最为熟知，而且运用最广泛的就是中国式的“封建”概念，即被误解和滥用的封建概念。马克垚（2008a：375—376）《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封建”社会的认知进行了系统考察：从严复起，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把封建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兼及社会和经济内容。

笔者则认为，在我国沿用近百年的“封建社会”已经成为一种俗定约成的概念，虽然其中有日语对欧洲封建社会翻译的因素在内，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的理解，即不会因此而与西周的“分邦建国”等同起来，也不会与欧洲的中世纪画等号，就如同“干部”“逻辑”“图腾”“乌托邦”“幽默”等外来词一样，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其真实含义的理解。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诸如有成果系统探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人口问题、经济结构及其运转、王朝兴亡周期律，以及6—14世纪的社会生活等（宁可，2014）。在这一方面，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的研究成果，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参见赵德馨，2023；魏明孔，2023）。

（三）新中国关于中国经济通史的成果

宏恢贯通的经济通史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建立在断代经济史、行业史、区域经济史等研究基础上的集大成者。这一方面的成果比较多，下

面只是就其中的几部略作介绍。^① 由吴承明作序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本，集国内经济史学术研究之大成，其中“先秦经济卷”主编周自强，“秦汉经济卷”主编林甘泉，“魏晋南北朝经济卷”主编高敏，“隋唐五代卷”主编宁可，“宋代经济卷”主编漆侠，“辽金夏经济卷”主编漆侠、乔幼梅，“元代经济卷”主编陈高华、史卫民，“明代经济卷”主编王毓铨，“清代经济卷”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在国内外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这九卷本的《中国经济通史》，也可以看成是断代经济史的优秀成果，每个断代均是由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担纲，反映了各个时段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九卷本的《中国经济通史》合之为—、分之—为九，是中国经济通史与断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功样本。

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② 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内容涵盖了先秦至清代的土地制度、包括水利及漕运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等，还对于是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讨论（钱穆、叶龙，2014）。

宁可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宁可，1999），朱伯康、施正康所著两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朱伯康、施正康，1995），田昌五、漆侠总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田昌五、漆侠，1996），赵德馨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赵德馨，2002），均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贯通著作。

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从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域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古代经济的归宿，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史（齐涛，199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经典之作（许涤新、吴承明，1985）。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代学者通力合作的多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史》，成为研究近代经济史

① 其中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曾经组织了12篇综述文章，最后结集为《与时同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2018）。

② 另外，侯家驹所著两卷本《中国经济史》（侯家驹，2008）亦值得重视。

的扛鼎之作。吴承明、陈争平主编三卷本《中国市场通史》，是一贯通性著作之代表（吴承明、陈争平，2021）。

另外，凡中国通史及断代的史学论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经济史内容，其中有些经济史方面的内容见解独到，颇具启迪价值，不失为中国经济史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忍痛割爱。

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既是一个新的领域，更是异军突起的研究方向。1985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付梓后，新中国经济史论著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问世并不断续写，标志着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诞生。^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的大型资料集，分专题将1949—1965年中央档案馆的经济档案整理出版，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陈廷煊、武力、徐建青、赵学军等人完成，成为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史料。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要叙述了1949—1952年新中国经济历史（吴承明、董志凯，2010）。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史学界便就围绕如何评价我国历史上的商品流通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对于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主要内容的讨论，包括历史上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是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说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经济等（吴承明，1997）。关于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讨论，近年来仍然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吴承明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没有像西欧中世纪那样有个300年左右的倒退。在16世纪中国市场已经有了“转变”的端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起伏跌宕，直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因此不能将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我国认真地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还是邓小平时代的事。但是其源远流长，历史上的顺流和逆流都可为这种转变提供借鉴。研究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应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16世纪到21世纪，上下500年，内容是很丰富的（吴承明，1996：290）。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949—2019）》是对新中国70年经济史的最新探索（杨德才，2020），值得一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既有包容也有区别，从学科概念上讲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包含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内。

在包括根据地在内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异军突起势头的同时，传统经济史也是老树新枝，亦有值得关注的成果。

（四）中国经济史学科显得比较成熟

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从萌芽到形成再到比较成熟（李伯重，2013），赵德馨教授认为是有如下标准的（赵德馨，2022）：一是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机构；二是出现了以中国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刊物或报纸上专业副刊、专业栏目；三是出现了以研究中国经济史为旨趣的专业学术团体；四是这些机构、刊物、团体等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目标、理论、方法、规范和共同认可的学科名称；五是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专题发展到综合，从专题经济史、部门经济史走向国民经济史，出版了一系列的论著，特别是多卷本的国民经济史著作；六是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与机制（包括大学里设置经济史专业的课程、教席、教研室，拥有经济史专业的专业化本科生、研究生与导师）。按照上面这个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专业性学会的先后成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及一些经济史集刊的相继问世，一些经济史研究院、所、室、中心的设立，一些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的设置，经济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的招收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有学者提出经济史学科成熟的标准是：经济史实的系统化、经济史理论的系统化、经济史学理论的系统化、经济史学科历史的系统化和经济史学科工具书的系统化（参见王梅梅，2021）。在这五个系统化中，经济史实的系统化和经济史学科历史的系统化是基础，经济史理论的系统化和经济史学理论的系统化是升华，经济史学科工具书的系统化则是综合性表现（赵德馨，2022）。

另外，经济史资料的大量发掘、出版、整理、甄别与利用，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方面。资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一枝独秀，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受到各种局限。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明显的改观，整理出版了大批古代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同时，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甲骨文、金文、秦汉三国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民间文书、族谱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古代经济史研究，与

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补充、匡正或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为古代经济史研究增添了活力。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其中,走马楼简牍的整理和利用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等,系对吴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对推动三国时期尤其吴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很有意义,因为三国经济史研究中有许多空白,走马楼简牍正好可以弥补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使得该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相对活跃。各地发掘和整理的墓志、碑刻资料,令人眼花缭乱,其对于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在对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中,清史纂修工程组织编辑出版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史料,对于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功不可没。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大典》。该典系搜集、整理、编纂自有文字记载至1912年以前的有关汉文字资料,计24个典。其中《经济典》、《农业典》和《工业典》包含丰富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资料,计1.3亿字,这些资料将对推动传统经济史研究有所裨益。

前面说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始于改革开放,虽然这期间的研究多有曲折,包括高校经济学院在改革开放之初无经济史的课程,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仍然不失为重要的研究黄金期,经济史研究呈现了全方位和纵深发展的格局,研究成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值得一提。就笔者个人的粗略统计和估算而言,仅在“十三五”期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经济史相关论文有1.4万篇左右,学术著作约400部,而资料集超过了100部。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方法和理论都有新的进展和变化。经济史研究的热度十分喜人,比如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每次都是以文会友,参加会议的同仁都会超过300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史的研究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态势。

(五) 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史人才培养

在我国经济史学科建设中,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史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唐代韩愈总结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之职能,尤其“百工之人,不耻相师”^①成为当时工匠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传统经济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人才教育与培养,却是

^① 《韩昌黎全集》卷12《杂著》二《师说》,第185、186页,中国书局1991年影印本。

近代以来的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

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史的教学是分不开的。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教学与人才培养，便成为当时的一股新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在安徽大学等高校讲授经济史。1932—1936 年，傅筑夫先生任中央大学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1947 年上半年，傅筑夫在东北大学任商学院院长，讲授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1947 年 8 月，傅筑夫任南开大学教授，给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门课，同时还在经济研究所讲授研究生的课程，另外还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剑农在 1943 年就出版了《中国经济史讲稿》（李剑农，1943）。陈振汉 1946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史等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中设立经济史课程的高校首推中国人民大学，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并且专门设置了经济史教研室，特别是在 1953 年至 1956 年由尚钺教授牵头举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史大家。南开大学的傅筑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班的任教，为其教育生涯留下了浓厚一笔。1953 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招收了 16 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均是各大学德才兼备的在职人员，学制是 3 年。1954 年 9 月傅筑夫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国民经济史教授，系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班的专业任课老师。傅筑夫到中国人民大学兼职伊始，就一边授课一边编写讲义，并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傅筑夫在这个研究生班的讲义最后成 80 万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这 16 位研究生，后来均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领军人物。今天仍然活跃在学坛的经济史大师、新中国经济史奠基者之一赵德馨及周秀鸾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另外已经谢世的如南开大学的郭士浩、复旦大学的叶世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陈振中、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的钟振和侯宗卫、辽宁大学的于素云和张俊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耀焯、兰州大学的魏永理等，均是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名家（孙睿，2023）。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和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史研究在国内外独树一帜，引领着经济史研究的方向。我们现在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史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并驾齐驱。时下高校或研究单位，一般是世界经济史团

队中很少有中国经济史教学与研究人员，或者中国经济史比较薄弱；而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团队中，又没有搞世界经济史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力量都非常强，学院老师编著的《世界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史》等成为高校教材，在全国经济史团队中鹤立鸡群。二是理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相得益彰。三是经济史教学与经济史研究并重。前面已经强调了，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经济史课程、成立教研室并最早招收经济史研究生的高校，这一优良传统在21世纪得到了发扬光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率先呼吁加强经济史教育与研究，如2015年主办了“在中国经济学中如何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学术研讨会，社会影响非常大，这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每年举办“经济与历史”学术会议的第一届会议，确实在引领中国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方向。

“十三五”期间各研究单位及高等院校对于经济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比较重视，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史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和中国史二级学科专门史的主要方向之一，^①系重要的基础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经济史研究团队，表现出了强劲势头，且各有特色。在经济史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面，数量逐年增加，博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与创新性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上海财经大学^②和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成立经济史学系，在经济史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博士后流动站中的经济史研究人员数量在增加，博士后在站期间在申请博士后文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显示出明显优势，系补充高校和研究机构经济史人才的重要渠道。经济史研究人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各研究单位均比较重视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在经济史研究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标志性学术人才，且有些研究团队还形成了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经济史学派。

在经济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经济史教材的编写便显得非常重要。在讨论我国经济史学科时，除了经济史学术研究之外，经济史教学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于经济史人才的培养、经济史学说的传播等意义非凡。

① 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就国家学科名录来说，历史学科中就有5个一级学科，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军事史、科技史，均涉及中国经济史的内容。

② 上海财经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经济史学系的基础上，于2020年12月成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

这里只是就有比较大影响的经济史教材情况作挂一漏万的叙述。

赵德馨主编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其后连续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1）》等，均是科研单位和高校培养经济史研究生的必选教科书。严中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系统上探讨研究方法的课程，1983年将教授的内容写成《和青年谈科研方法的几个问题》，发给研究生参考；1984年在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严中平，1986），在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吴承明从2000年开始连续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最后整理出版（吴承明，2006），成为经济史领域的名著，也成为经济史学科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章开沅主编的《中国经济史》是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大学教材（章开沅，2002）。南开大学王玉茹主编，北京大学萧国亮、北京师范大学宁欣副主编的《中国经济史》（王玉茹，2008），已经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经济史教材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史学科的教学需求，经济史教材显得比较单调。

四、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展望

通过前面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源流、发展的简单梳理，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史学科已经显得比较成熟，取得了一定成就。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诸如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评论尤其学术批评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系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对新公布的经济史资料的甄别、深入解读和研究显得严重滞后；重复研究乃至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贯通宏大理论突破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经济史学科的内封闭性比较严重；经济史教材还显得单调；对我国第一代、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进行整理与研究重视不够；一些研究背离经济史的本质；近现代档案资料公布严重滞后；等等。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不足，需要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经济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无论研究范式、方法和理论，肯定是多元的。人类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相应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方兴未艾；今天人类面临生存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史研究是未来学术界必然关切的

课题；区域经济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取得重要成就的领域，但是目前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核心区域的经济史研究，而对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非核心区的经济史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甚至还有一定的空白点，这无疑会影响我们对全国经济史的整体认知。此外，包括瘟疫在内的灾荒史研究、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对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学家的学术总结，以及对于共产党根据地的经济史研究等，都会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下面不揣简陋试图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未来略作展望。

一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全世界范围年逾三年的蔓延，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生产、生活与社会秩序乃至观念，这对今后经济史研究无疑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联的自然灾害特别是疾病史的研究，包括赈灾、疫情预防与应对、民间自救与发展经济等，会成为今后新的研究热点，将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另外诸如财政史、区域经济史、海洋经济史、中外经济比较等，仍然是经济史研究方兴未艾的领域。

二是全球视野下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史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专业人员从资料与理论两方面进行不懈努力，为进一步形成并确立中国经济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叶坦，2014），当然这种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融入世界经济史话语体系之中（王玉茹、张玮，2010）。

三是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融合，将系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借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是经济史学科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是经济史资料的搜集、甄别、消化和利用，尤其数据库建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口述历史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经济史学界将会进一步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出版，重视经济史数据库建设，重视经济史资料的交流与共享，为经济史实证与理论研究提供更加扎实的资料基础。

五是贯通宏观的研究成果颇受期待，古今贯通、中外贯通的学术著作必然受到学界青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这一方面已经有所体现，相信今后会有有一定数量的重要成果问世。诸如《中国大通史》中的《中国经济史》这样的贯通性论著，会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期待，特别是其撰写范式会对今后经济通史的撰写产生积极影响。有学者提出面向 21 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是“总体史”，这无疑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方向。

六是社会转型研究有所突破。目前我国乃至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近代以来实践性和理论针对性非常强的经济史学科，学者理宜将研究视野置于人类历史上的社会转型，从经济史的角度对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经验与教训。

七是鼓励开展经济史学术评论与批评，在坚守学术传承的前提下促进学术不断进步，这包括学术规范、学术创新诸方面的内容。同时，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八是对近代以来的经济史学术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包括学术论著、经济史学派、代表人物等，会成为今后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 《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编，2018，《与时同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凤凰出版社。
- 陈支平，2008，《跨越时空论“封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冯天瑜，2006，《“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 冯天瑜，2008a，《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冯天瑜，2008b，《严复、陈独秀“封建观”比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侯家驹，2008，《中国经济史》（上、下），新星出版社。
- 侯建新，2005，《“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黄敏兰，2008，《从四种“封建”概念的演变看三种“封建社会”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伯重，2013，《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修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李根蟠，2004，《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第3期。

- 李根蟠, 2007, 《“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 《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
- 李根蟠, 2008, 《略谈马列主义的封建观和社会形态观》,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根蟠, 2018, 《甘泉同志与“中国经济史论坛”二三事》,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
- 李红岩, 2008, 《20世纪30年代的“封建”论争》,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华瑞主编, 2010,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天津古籍出版社。
- 李剑农, 1943, 《中国经济史讲稿》, 中国书局。
- 梁启超, 1987a,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第三章《经济专史及其做法》, 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梁启超, 1987b,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林甘泉, 2008, 《“封建”与“封建社会”的历史考察》,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林文勋、田晓忠, 2022,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 《思想战线》第5期。
- 马克垚, 2008a, 《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马克垚, 2008b, 《封建主义概念的由来与演变》,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宁可主编, 1999, 《中国经济发展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
- 宁可, 2014,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齐涛主编, 1999, 《中国古代经济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
- 钱穆讲授, 叶龙记录整理, 2014, 《中国经济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瞿同祖, 1936, 《中国封建社会》, 商务印书馆。
- 孙睿, 2023,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学的发展》, 载魏明孔主编《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报告(202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唐艳艳、赵德馨, 2023, 《〈汉书〉与中国传统型经济史学范式的形成》, 载魏明孔、戴建兵主编《中国经济史评论》第2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陶希圣, 1929, 《中国封建社会史》, 上海南强书局。

- 田昌五、漆侠总主编，1996，《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4卷），齐鲁书社。
- 王梅梅，2021，《“2021年度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 王玉茹主编，2008，《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玉茹、张玮，2010，《国际经济史学研究的新趋向——从第十五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谈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魏明孔，2016，《“学派”与学术杂志：追记吴承明先生关于经济史期刊的点滴教诲》，载王玉茹、吴柏均、刘兰兮编《经济发展与市场变迁——吴承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 魏明孔，2023，《傅筑夫文集·序言》，载《傅筑夫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吴承明，1996，《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 吴承明，1997，《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 吴承明，2006，《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吴承明，2008，《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吴承明、陈争平主编，2021，《中国市场通史》（1—3卷），东方出版中心。
-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3卷），人民出版社。
- 严中平，1986，《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人民出版社。
- 杨德才，2020，《中国经济史新论（1949—2019）》（上、中、下），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杨祖义，2004，《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叶坦，2014，《重写学术史与“话语体系”创新——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及其典型案例考察》，《经济学动态》第10期。
- 张岂之、刘文瑞，2008，《封建社会概念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 章开沅主编，2002，《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 赵德馨主编，2002，《中国经济通史》（1—10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 赵德馨，2022，《中国经济史大辞典·前言》，载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大辞典》，崇文书局。

赵德馨, 2023, 《傅筑夫对经济史学科的探索及其独特贡献》,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

赵轶峰, 2017,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 初编》, 科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经济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1988,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I·中国经济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2008, 《“封建”名实问题论文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朱伯康、施正康, 1995, 《中国经济通史》(上、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Wei Mingkong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mportant subdisciplin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 and history. It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s, Chinese history,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t is one of the basic disciplines in social sciences.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economic contents in the official histories, such as the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in *Historical Records*, “shitong” (ten political books compiled by ancient official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describ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a focus 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outline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Keywords: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Prospects

JEL Classification: N00, N01, N15

(责任编辑: 王姣娜)